

国家“十一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

衣俊卿 主编

哲学批判 与 解放的乌托邦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

● 王雨辰 著

Karl Marx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十一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

衣俊卿 主编

哲学批判 与 解放的乌托邦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

● 王雨辰 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批判与解放的乌托邦 / 王雨辰著. —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07.12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 / 衣俊卿主编)
ISBN 978-7-81129-005-9

I. 哲… II. 王… III.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1828 号

丛书策划 李小娟
责任编辑 管小其
封面设计 咸泽寿
责任校对 董丽洁

哲学批判与解放的乌托邦

ZHEXUE PIPAN YU JIEFANG DE WUTUOBANG

王雨辰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邮编 150080
电 话	0451-8660866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黑龙江省教育厅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 / 16
印 张	25
字 数	360 千
书 号	ISBN 978-7-81129-005-9/B·6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王雨辰，男，1967年12月生，武汉人，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兼任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兼任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价值哲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人学学会理事，湖北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哲学史学会理事。共出版学术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五十余篇。

总 序

1848年《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因此而改变。回顾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的历史,有两条大致清晰的线索:一是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推动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获得巨大发展,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二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一直受到世界思想界的关注和重视。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经历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经历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无论世界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无论面临着什么样的理论挑战和实践修正,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世界思想界难以回避的强大“磁场”。回顾20世纪的历史,不难看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全方位的研究,已经成为贯穿整个世纪的现象,并由此形成众多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

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面临着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观的受挫、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变化,特别是发达工业社会全方位的文化危机,一批有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应运而生: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布洛赫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赖希等人的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的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差不多与此同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社会主义的改革实验为背景,涌现出许多重要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以彼得洛维

2 哲学批判与解放的乌托邦

奇、马尔科维奇、弗兰尼茨基等人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实践派,以赫勒、费赫尔、马尔库什等人为代表的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以沙夫、科拉科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波兰意识形态批判流派,以科西克和斯维塔克等人为代表的捷克人本主义流派等。

马克思的批判的和实践的学说具有任何其他理论都难以比拟的开放性和历史穿透力。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众多代表人物进入迟暮之年,特别是随着卢卡奇、布洛赫、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萨特等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相继谢世,人们原本以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批判运动即将成为“告一段落”的历史。然而,历史的进程给我们提供了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种新图景:不仅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哈贝马斯、施密特、沙夫、科拉科夫斯基、赫勒、马尔科维奇、弗兰尼茨基、斯托扬诺维奇等人一直活跃到世纪之交,而且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中,一些新兴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从更加多维的视角批判现存社会,出现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解放神学的马克思主义等许多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形成了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更为多样化的格局。

20世纪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重大历史变化又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提出了挑战。一些偏激的人士,如弗朗西斯·福山,基于这些变化,断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他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成为“历史的终结”。然而,历史进程又一次坚定地展开着自身的逻辑,马克思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并没有因为苏东剧变而减弱,反而有增无减。从1995年到2004年,在巴黎举行了四届“国际马克思大会”,在纽约、伦敦、图宾根、加利福尼亚等地,也相继召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数从数百人到数千人不等。1999年和2005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国际互联网上评选“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马克思都名列榜首。世纪之交,不仅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多样化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依旧活跃,而且,德里达、杰姆逊等一些重要的思想家也纷纷“走近马克思”,从不同方面阐释

马克思学说的当代价值。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作出的“不能没有马克思”和我们“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的断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马克思学说特有的影响力。

我一直以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真正体现了哲学的开放性和批判性本质,他的学说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哲学的基本理念,而是以对人之生存的本质性的、批判的文化精神的自觉为根基的。马克思学说的内容十分丰富,马克思一生关注的焦点问题也不断变化。然而,无论是其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分析,还是关于哲学的思考;无论是其关于暴力革命、政党策略、欧洲革命、东方社会特征的分析,还是关于现实经济运行机制的揭示;无论是其关于唯物史观原理的阐释,还是关于从抽象到具体等方法论的探讨,在深层次上都服从于一个最根本的理论关切:推翻和扬弃“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把体现哲学本性的这种文化批判精神奠基在人的实践内在地具有的不断超越、不断扬弃异化的批判本性之上。这正是马克思学说的巨大生命力的根源所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为包括海德格尔、萨特、德里达等在内的许多当代思想家所敬重,他的学说的价值绝不会为我们的时代所穷尽。

显而易见,20世纪以来,在人类实践的各种转折和变化中,众多的理论流派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马克思”,这正源自马克思学说的这种实践本性和批判精神。我们看到,无论这些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在主题、问题域、范式等方面存在多大差异,无论它们在重新阐释和张扬马克思的思想时存在多少误读和偏差,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像马克思一样,这些新马克思主义流派首要关切的不是理性的逻辑,而是人类的命运;它们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学说基于实践之超越本性的历史性和实践性的文化批判精神,在20世纪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针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变化和文化境遇,探寻新的革命变革的思路,以深刻的方式切入20世纪人类生存的焦点问题,开拓出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的新视野。

正因为如此,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着特殊的实践意义和指向。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从表面看,涉及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研究方法论问题,也涉及在多维视野中对

4 哲学批判与解放的乌托邦

于这些理论观点的评价问题,但是,从更深层次来看,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关注热情更多地是这些理论的现实“所指”。我们是以折射的方式来理解和把握发达工业社会的发展状况和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或文化批判理论是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危机的直接的理论反思。因此,当代许多中国学者,包括专业人士往往是通过这些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来深刻理解 20 世纪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人类所面临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他们对于发达工业社会的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大众文化、技术理性、意识形态、物化和异化、国家和领导权、性格结构、消费社会、文化逻辑、交往机制、生活世界、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信息化、全球化等的认识都不同程度地积淀了国外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左翼激进思潮的理论资源。

在这种意义上,对于置身于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而言,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各种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就不仅具有一般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结束了各个孤立的、彼此分离的民族历史,而开辟了“世界历史进程”。工业化与现代性的不断扩展、信息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强有力推进,使世界任何地方的本土问题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同全球问题和世界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因此,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野中,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一定是同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具体说来,在全球化背景中,封闭地探讨中国问题、孤立地描述世界问题、绝对地用世界问题来剪裁中国问题、绝对地强调中国问题的独特性等做法都是十分有害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毫无疑问必须把“中国问题”作为我们的落脚点和聚焦点,但是,决不能孤立地就中国问题而研究中国问题,必须学会从中国的视野去透视世界问题,进而从世界的眼光和全球化的视角去审视中国问题。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这些 20 世纪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擦肩而过。毫无疑问,在面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众多理论流派时,忽视它们的局限性、失误和理论错误,肯定是错误的理论倾向;然而,不去认真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所提供的重要启示,

同样是不能容许的褊狭和封闭。令我们十分高兴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005年11月25日举行的第26次集体学习,以“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题,专门了解了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情况,其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情况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因为,“在西方国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当代流派”。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要瞄准当今世界的学术前沿,着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提高学术创新能力,努力形成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要求、吸收当代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中国学术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翻译成果和理论研究成果。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单独立,特别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建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正在成为学术界越来越引人瞩目的学术领域和理论热点。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回顾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学术界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进展,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因此,在为政治局第26次集体学习就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状况作了讲解之后,我一直考虑以某种方式来推进这种回顾和总结。我们在这里提供给读者的这套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是几位中青年学者过去十几年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心得。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成果可以比较全面地展示中国学术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状况。当然,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目前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研究范式、理论评价、推陈出新等方面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存在很多局限性,甚至存在某些理论失误。正因如此,适时地对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作出清醒的、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具有特别的意义,将有助于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我们有理由期待,在同国外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收获更多的理论成果和思想精华。

衣俊卿

2007年11月15日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序言)

中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研究如果从徐崇温先生在1982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算起,至今也不过25年时间。然而这25年,既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认识不断走向深入的时期。

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和理论视阈的不断拓展,使得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三个突出特点:其一是研究者立足于不同的哲学理念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理解,使得他们在如何研究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分歧乃至激烈的争论;其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之间出现了双向互动的格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促进了人们更加深刻地研究和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资源;其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群体不断扩大、研究范围逐渐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拓展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一个独

2 哲学批判与解放的乌托邦

立的二级学科。回顾、分析上述三个特点形成的过程和所包含的信息,对于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中国学术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中形成的上述三个特点,实际上也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历了如下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1982—1986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传入期。按照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徐崇温先生的说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并非出于理论自觉,而“从一开始就是由努力完成政治任务所带动起来的”^①。更为关键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存在着双重的错位。从社会历史背景看,虽然经过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但总的说来中国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起步阶段,加之“左”的教条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科学技术、消费主义等现代性批判的话语系统一时还很难为中国学术界所理解,也较难为中国社会所接受;从理论背景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被认为是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正统,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反对这种解读模式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被看做是打了引号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即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是引进和评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性著作和代表性观点,为日后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了一些准备性工作。

第二阶段(1986—1989年)为中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期,出现了全国范围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热和争论热。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1986年以后,客观上要求正确认识和评价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和文化思潮;同时,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哲学理念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批判地反思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的理论得失,体现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更深入的探索和理解。理论视角的变化,使人们在如何理解、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上产生了意见分歧,学术界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争论热潮,争论的目的就是要摆脱在“辩证唯

^① 徐崇温:《徐崇温自选集》,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中建构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框架。这场争论不仅使学术界熟悉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命题,深化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而且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资源,形成了二者之间双向互动的关系。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影响,著名的学者张一兵先生曾经指出:“最初接触这一新的理论领域,还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其时是在徐崇温先生撰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1982)中第一次听说了这个思想流派的。在当时的直觉中,有一种深深的震惊:研究马克思哲学还能这样出彩”^①。而为了获得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权,迫使他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即“回到马克思”^②。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主体性问题”、“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人学”以及“现代性问题”的探讨中,都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③。无论是否存在这种解读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都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系,这一点则是确定无疑的。

第三阶段(1990年至今)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化期,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化期。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格局发生了根本性转换,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具体体现在:一是研究主题进一步扩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技术理性批判、消费主义文化批判、生态批判等获得了学术界广泛的共鸣,使得学术界从如何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进一步扩展到研

① 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2页。

② 张一兵:《深度解读:卢卡奇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载《哲学动态》1999年第8期。

③ 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章。

究其社会批判理论和现代性理论。二是研究方式从过去的宏大叙事转向了微观研究和追踪研究,学术界不仅出版多部西方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同时也出版了多部研究专题性问题、研究代表人物的著作。在追踪研究方面,分析学、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逐渐纳入人们的研究视阈中;更为重要的是,学术界开始关注“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等,并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统称这些在后现代思潮中理解、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流派,“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从而实现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换。

但是也需要指出,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实际上也暗含问题。由于中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并由此引发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它到底是不是反对列宁主义。应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上的确与恩格斯、列宁是有差别的,但是“有差别”是否就是反对“列宁主义”、进而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则是一个需要细致研究的问题。为了避免研究的主观性,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更加深入,一部分学者认为应当绕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直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更加激进的学者甚至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毫无研究价值的“伪问题”。

还有一部分学者为了避免研究之前预先设定主观框架,于是用一个相对中性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地域性概念代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按照国务院学位办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的研究范围的界定,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外国共产党人根据时代变化和本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其中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产党的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二是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三是既批判资本主义又批判现实社会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研究;四是由马克思主义文本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等。可以看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实际上是对国外出于各种目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形成各种理论思潮的总称。显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学科既包括同情马克思

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流派,也有为反对马克思主义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流派,还存在着仅只是借鉴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与马克思保持名义联系的后现代思想家。一旦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取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候,事实上问题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就是,能否用同样的指导思想和态度来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所包含的所有理论和流派。对此,笔者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按照同样的指导思想和态度来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中的所有理论和流派,“国外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就变成了“国外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外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当然应当被看做是一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其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对于“西方马克思学”、“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而言毕竟是有其特殊内涵的,即它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产生、以探索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为目的的一股思潮,只是后来在马克思主义阵营教条主义压制之下,才不得不在西方共产党之外发展,不论其理论是否正确,它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按照笔者的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对于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探索所形成的理论,这其中虽然也包含了大量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但是总体上看,他们的理论侧重于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战略和策略的探讨。其二是原本属于西方共产党内的理论家,他们反对当时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化运动”和西方共产党教条主义地照抄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力求根据西方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探寻一条适合于西方社会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于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他们的理论探索从一开始就遭到共产国际以及西方共产党的批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得不作自我批评,对于西方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保持沉默而不公开发表批评意见,从而被保留在西方共产党内。还有一部分人不接受批评意见被开除出西方共产党,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党外获得较大的发展。这也造成他们理论的特点:一方面无法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相结合,战略问题和策略问题成为其理论的薄弱点;另一方面他们往往善于将西方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予以探讨,其理论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从而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三是反对资本主义、同情社会主义的西方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不仅有利于人们从学理上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而且也使人们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显然,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其他思潮的研究在价值和意义上根本无法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相提并论。但事实上,当前的情况是,学术界更多的是引进和评介 20 世纪后期出现的各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潮,这种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是必要的,但是因此而冷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则是令人担心的,也是需要人们认真思考的。

回顾中国学术界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程,笔者认为,要进一步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要注意如下三个问题:第一,应当重视研究方法转换。如果拘泥于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以此为标准来研究和评判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么就势必不可能客观地看待和认识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问题的关键应该在于,是否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回答和解决不同民族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时代问题。这事实上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会在实践过程中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同时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流派发展是其必然结局。而这一切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理论本性使然。跳出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深入了解西方社会的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不同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相互理解、平等对话和争鸣,是推进和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和前提。第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应当有所侧重。其原因在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众多、内容庞杂,不同流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关联性不同,对当前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定具有不同的重要性。笔者的看法是:研究的重点应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各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总结他们理论探索的得失和实践的经验教训,这无论是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第三,应当从评介式研究转向问题式研究。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停留在资料评介上,这种评介式研究在国外马克思

主义研究的初期阶段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中国学术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日益深入的今天,从评介式研究转向问题式研究,总结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特别是要注意研究他们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实践观、资本主义观、社会主义观、消费观、技术观、生态观以及伦理价值观等问题,则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研究这些理论问题,不仅会极大地推进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而且也必将会极大地拓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视阈,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代转型。

王雨辰
2007年8月

目 录

总序 / 1

序言 / 1

第一编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总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再清理与再认识 / 3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回眸与反思 / 15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辨析 / 25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阈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 38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转向 / 54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价值批判与解放的乌托邦 / 68